

邓小平

与香港回归

Deng Xiaoping and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齐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国 / 家 / 社 / 会 / 科 / 学 / 基 / 金 / 项 / 目

邓小平 与香港回归

Deng Xiaoping and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关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齐鹏飞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

ISBN 7-5080-3463-5

I. 邓… II. 齐… III. ①邓小平理论 - 一国两制 - 理论研究
②香港 - 主权回归 - 理论研究

IV. A849.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31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670×970 1/16 开本 21 印张 260 千字 3 插页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引 言	1
——“香港热”、“香港学”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 “香港模式”	
1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19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 1949 年至 1979 年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	
2 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53
——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 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成型	
3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83
——邓小平与“秘密磋商”阶段的中英两国政府 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	
4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05
——邓小平与“正式会谈”阶段的中英两国政府 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	
5 创造性的杰作	159

——邓小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 187

——邓小平与“十二年过渡时期”的“平稳过渡”
和“顺利交接”

结 语 213

——自“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西藏模式”、
“台湾模式”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
“香港模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附录一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233

附录二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纪事 247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77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 280

附件二 《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 288

附件三 《关于土地契约》 290

附件四 《中英双方交换的备忘录》 292

附录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295

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319

附件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 320

附件三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322

附件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25

引言

——“香港热”、“香港学”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

2004年的甲申年，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当代中国和平统一工程的标志性建筑——“一国两制”的“香港大厦”、“澳门大厦”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和忌辰七周年。七年前的1997年2月19日，即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仅仅131天之际，一直切切不能释怀“到香港自己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愿望的邓小平溘然辞世。中国内地媒体云：“小平同志带着遗憾走了，他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没有实现亲自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这不仅他的遗憾，也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遗憾。”香港媒体云：“邓公不能来香港，是爱祖国、爱香港的港人‘永远的痛’。”对于海内外舆论一时间弥漫的“变”或“不变”的忧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表示：“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不会变，邓小平理论指导“进行时”的香港回归和“将来时”的新香港建设的“至尊至崇”地位不会变。“我们一定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一定要把香港的事情办好。”七年后的2004年2月19日，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后的2555天，在新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遭遇严峻考验的非常时期，新华社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4年6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的谈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用邓小平“爱国者治港”和“四个统一”——“‘一国’与‘两制’、‘爱国’与‘爱港’、‘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与‘坚持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为“十字路口”的香港“正本清源”，指示“香港明天更好”的方向。其地位、

其意义一如当年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自1990年至1997年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所言：“‘一国两制’方针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亲自领导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和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以及过渡时期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他对香港问题了如指掌，在此期间他所做的许多精辟论述，至今一点也没有过时，仍然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香港事态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许多英明预见。重新温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全面准确理解、掌握和贯彻‘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对于正确观察和处理香港事务都具有深远意义，而这恰恰也是维护香港长期稳定与繁荣的根本保证。”^①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凝焦“世纪伟人”邓小平，再一次凝焦“东方明珠”香港。

对于从事当代中国“国家统一”问题尤其是港澳回归问题研究的学者而言，新旧世纪之交的这几年，绝对是一个令人思想兴奋的时间段——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②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③“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自理论至实践成功奠基。不仅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提出的自旧香港至新香港、自旧澳门至新澳门的“十二年过渡时期”的“两大奋斗目标”——“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全面实现，而且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提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之特别行政区“香港明天更好”、“开创澳门新纪元”的发展前景亦初步呈现。虽然，当代中国“国家统一”问题的“重中之重”——台湾问题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僵局久淤不化，“三通”通邮、通商不通航，囿于时冷时热的“大两岸关系”的“小两岸关系”张弛无序，但是，以台湾问题的解决

① 李鲲鹏、李凯：《内地知名人士评论：小平谈话仍是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的指针》（2004年2月22日）；2004年2月22日新华网。

② 江泽民：《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1997年7月1日）；199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③ 江泽民：《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1999年12月20日）；199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为最初和最终设计蓝本的“一国两制”之“国家统一”工程，毕竟由于港澳回归的“率先垂范”而有了可资实证和借鉴的样板。“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①“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②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之和平统一工程的成功典范，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自“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至“主权收回、制度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十六字方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港澳问题特殊政策的结构性、战略性调整，自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二十二轮外交谈判至中葡两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四轮外交谈判，自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出台至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的出台，自香港“十二年过渡时期”中方“以我为主”破解英方的“光荣撤退”至澳门“十二年过渡时期”中方“以不变应万变”破解葡方的新旧“三大问题”，自“爱国爱港”的新香港政府的诞生至“爱国爱澳”的新澳门政府的诞生，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每一步拓展，无不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之一，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正是在圆满地解决前人“未竟之业”、“未圆之梦”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实践中，被海内外共誉为“天才的创造”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逐步成型、成熟，并有机地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44页。

② 江泽民：《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1999年12月20日）；199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①邓小平亦自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②是他在有生之年所完成的可以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③相提并论的“无愧于先人与后人”的“政治交待”。因此,对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即对邓小平“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地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不仅是洞开了邓小平和邓小平思想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一国两制”之“国家统一”工程的“三步走”战略(“九七”之香港、“九九”之澳门和二十一世纪初叶之台湾)尤其是“第三步”战略以及“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生命力”的“实验”,亦不无启示之益。

—— 对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即对邓小平“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在香港回归“进行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高峰期。自邓小平晚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大背景下“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新思维”,“揭幕”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并以正式签署“九七”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谢幕”以后,香港问题就逐步成为中国(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和国际(主要是英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在香港有特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西方国家)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凝焦的“热点”研究课题。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于

① 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7月1日);1997年7月2日《人民日报》。

②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84页。

③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95页。

香港问题的研究重点,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继承和发展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香港回归结束香港 156 年(1841—1997)的英国“殖民统治”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意义。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包括英国影响下的中国香港地区,其学术界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重点是香港回归在国际关系、国际法“逻辑”中的“合法性”问题,是世界政治发展史的“奇迹”——“一国两制”与世界经济史发展史的“奇迹”——“香港现象”的“兼容”问题,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背后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问题。进入自旧香港至新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时期”(1985—1997)以后,随着“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小宪法”——香港“基本法”的出台,尤其是“后过渡时期”(1990—1997)由于在所谓“民主化”问题上的纠葛肇中英双方“全面合作”的“蜜月期”结束而开始了中英双方的“全面对抗”并逐步“国际化”(主要是美国的介入),香港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学术界的“香港热”也持续升温。一方面,在中国内地,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是社会各界,以“香港明天更好”为主旋律,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宣传为重点,对于香港回归倾注了太多太多的“献礼”热情,一时间,香港回归成为媒体“曝光”最频繁的一个词,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以前的几年间,平均每年以“香港回归”为主题的会议逾百场、著作逾百部、文章逾千篇,且不计坊间各种版本的香港回归“演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于香港回归则“悲观主义”弥漫。英国的历史学家对于“太阳落山”心怀戚戚,对于英国在香港 156 年“借来的空间”和“借来的时间”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辉煌的文明历史”大唱挽歌;由于美国长期觊觎英国对于香港这个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在英国“光荣撤退”之际对于“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道义感”陡升,1995 年前后,美国政治学界关于“一国两制”就是“自由消失”、“民主消失”、“人权消失”、“法治消失”的“1997 年大限”说,美国经济学界关于香港回归就是“联系汇率制度崩溃”、“金融市场崩溃”的“香港之死”说甚嚣尘上。至于“台风眼”中的香港,其学术界的心态颇为复杂,作为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已经“英国化”的中国人,他们没有理由对香

港回归说“不”，但是，“一国两制”毕竟予他们以“不安全的陌生感”，在他们变“身份”的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九七”是喜忧参半。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香港“移交大典”和自旧香港至新香港“转型”没有“新闻”，加上“不干预”政策的敏感性，中国内地“九七”以前的“香港热”在“九七”以后迅速降温，学术界的香港问题研究亦“戛然而止”，一度的“显学”——“香港学”仿佛是在一夜间走向“边缘化”。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的几年间，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研究的著作不超过十部，文章不超过百篇。“不甘寂寞”的学术界已经“赶场”新的“热点”，刚刚成为“历史”的香港回归已经开始“尘封”，已经开始在学术视野里模糊不清。一样“缄口”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术界，除了香港回归的纪念日，如中英“联合声明”十五周年、香港“基本法”十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二、三、四、五、六周年的“纪念性”文章和“回忆录”，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研究的著作为数寥寥。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旧香港、新香港均有直接或间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英国和美国，对于“一国两制”的香港“热情”不减，英美两国政府每年都定期向英美两国国会提交以“自由资本主义”“变”与“不变”为主题的“香港报告”，英美两国的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关于香港问题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不辍，在他们标榜“价值中立”的关于香港问题研究的“客观化”学术成果中，香港回归的成功因素被“主观地”解读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惯性”，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的“弹性”。

在“九七”的“喧哗”渐渐隐去之际，细细翻检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关于香港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高质量、高水平的“精品”不过十数部计，而且主要是关于旧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梳理和阐释，“代表性”的如刘曼容的《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1841—1985）》^①、刘兆佳的《过渡期香港政治》^②、雷兢璇的《香港政

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

②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第一版。

治与政制初探》^①、迈因纳斯(Norman Miners)的《香港的政府与政治》^②、郑德良的《现代香港经济》^③、饶余庆的《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④以及杨奇的《香港概论》(上、下编)^⑤等等。至于旧香港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十二年过渡时期”以前的旧香港的“历史研究”，也有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代表性”的如安德葛(G. B. Endacott)的《香港史》^⑥、晦暗无光的香港^⑦、塞耶(G. R. Sayer)的《香港的诞生、少年和成年(1841—1862)》^⑧、《谨言慎行年代的香港(1862—1919)》^⑨、箫国健的《香港前代社会》^⑩、霍启昌的《香港与近代中国》^⑪以及金应熙“香港历史研究课题组”的《香港史话》^⑫、《香港古今》^⑬、余绳武的“香港历史研究课题组”的《十九世纪的香港》^⑭、《二十世纪的香港》^⑮等等。但是，对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自1979年至1997年的香港回归的“历史研究”，则基础非常薄弱。此一“专题性”研究为数寥寥的成果如刘伟的《香港主权交涉史》(上册)^⑯、姜秉正的《香港问题始末》^⑰、齐

① 商务印书馆(香港)1987年第一版。

②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本为伍秀珊、罗绍熙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一版。

③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④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第一版。

⑤ 初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内部调查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993年第一版。

⑥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⑦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⑧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⑨ Hong Kong: 1862—1919, the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⑩ 中华书局(香港)1990年第一版。

⑪ 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年第一版。

⑫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⑬ 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⑭ 中华书局1994年第一版。

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一版。

⑯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⑰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鹏飞的《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①,其重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以前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的“历史研究”;而王寅城的《香港的回归》^②、徐彬的《“九七”香港回归风云》^③,由于其“纪实性”的风格,香港回归的“历史感”不强。一些关于中国外交史、英国外交史和中英关系史的著作也都涉及到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如谢益显的《中国外交史(1979—1984)》^④、陈乐民的《战后英国外交史》^⑤、王红续的《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⑥,一些关于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著作也都涉及到了香港回归,如施汉荣的《“一国两制”与香港》^⑦、周毅之的《香港与“一国两制”》^⑧、程林胜的《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⑨、陈雪英的《邓小平与香港》^⑩,但是,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均非其“全程、全景”和“浓墨重彩”。主要是由于“时间性”、“政策性”、“资料性”诸因素的限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推出一部对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即对邓小平“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地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的研究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

■ 一 ■ 本人“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尤其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是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

① 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② 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③ 吉林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⑤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⑥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⑦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⑨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⑩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为基本立场,将自 1979 年至 1997 年时间段的香港回归作为一个刚刚拉开距离尚未“结晶化”的“历史现象”,通过对其全景、全程即香港回归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通过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成型、成熟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来“学术性”地探讨香港回归对于当代中国“一国两制”之“国家统一”工程的“三步走”战略“率先垂范”的典型意义,探讨香港回归对于当代世界“理性”地解决涉及主权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的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关于马尔维纳斯的主权争端问题、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关于直布罗陀的主权争端问题、“东西德”的“国家统一”问题、“南北朝鲜”的“国家统一”问题)“率先垂范”的典型意义,探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探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理论、国家结构理论和民族国家的“国家统一”的“合法性”理论的“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其研究难点是“时间性”、“政策性”、“资料性”诸因素的限制,尤其是“资料性”因素的限制。香港回归刚刚成为“过去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尚未“沉淀”和“过滤”,远者清楚近者模糊,没有“距离感”就没有“历史感”。香港回归是中国外交领域“动态”的研究课题,是学术研究亦为政策研究,非常敏感,包括所涉及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英人治港”是“殖民占领”、“殖民统治”而不是“殖民地”,如“香港移交”是“恢复行使主权”而不是“收回主权”,等等,是“学术性”的界定亦为“政策性”的界定。

本选题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量”的基础,比较丰富,如已经正式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①、《邓小平论

①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一版。

香港问题^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②和《邓小平新时期重要活动纪略》^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9—1997)》^④以及公开发表的《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关于邓小平会见英国朝野人士和香港各界人士的“新闻性”报道,提供了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如已经正式出版或非正式出版的《香港大事记》^⑤、《香港回归大事记(1979—1997)》^⑥和《香港前途问题资料选辑》^⑦、《香港问题文件选辑》^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重要文件》^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文件汇编》^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有关文献资料选编》^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理论与实践文献资料选编》^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⑬以及公开发表的《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关于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时期”“民主化改革”问题的外交谈判、“香港移交”和“新香港”的筹备的“新闻性”报道,提供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研究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选题在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在原始档案方面有严重的“缺憾”,如自1979年至1997年“时间段”涉及香港回归的中英两国政府的外交档案,除了一些必须“公开化”的外交文件,如1990年的《中英双方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与“基本法”相衔接问题的七份外交文件》,如1993年

①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第一版。

② 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③ 李红锋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⑤ 李宏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⑥ 袁求实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一版。

⑦ 香港《大公报》1984年编印。

⑧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⑨ 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秘书处1997年编印。

⑪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

⑫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的《中英关于香港 1994/1995 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和《香港代议政制白皮书》，等等，绝大部分没有“解密”。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讨论“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的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的会议记录，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外交部的“港澳工作会议”的会议记录，包括邓小平关于解决香港回归具体问题的大量的内部指示和内部讲话的记录，等等，基本上没有“曝光”；英国方面，英国内阁、英国外交部研究“光荣撤退”战略策略的会议记录，包括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梅杰(John Major)关于解决“香港移交”具体问题的大量的内部指示和内部讲话的记录，也基本上没有“曝光”。而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①、余绳武“香港历史研究课题组”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对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的“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新意”和“权威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经“解密”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英国内阁、英国殖民地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

由于在原始档案方面的严重“缺憾”，故，“零距离”或“近距离”介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尤其是涉及香港回归的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具有了特殊的利用价值。当然，由于中英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发表“量”非常不平衡，英国方面比较多，如英国香港政府的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的《葛量洪回忆录》^②、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东方与西方——彭定康治港经验》^③，如前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Percy Cradock)的《在华经历》^④、伊文思(Richard Evans)的《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缔造》^⑤，如前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忠诚的冲突》^⑥，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第一版。

②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1965. 中文本为曾景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4 年第一版。

③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future, London, 1998. 中文本为蔡维先、杜默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第一版。

④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1994.

⑤ Deng Xiaoping and N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93.

⑥ Conflict of Loyalty, London, 1994.

如前英国首相欧文(David Owen)的《宣告之际》^①、撒切尔夫人的《唐宁街岁月——柴契尔夫人回忆录》^②。在“九七”以前,在英国和中国的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英国新闻记者科特雷尔(Robert Cottrell)的《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③,其基本的“资料来源”,也就是对于中英两国政府包括英国香港政府涉及香港回归的主要当事人的访问。但是,由于他们普遍的“太阳帝国”的“殖民主义情结”,他们关于香港回归的“回忆录”对英国人在香港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历史评价是不竭的溢美之词,是百般辩护,并严重曲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特殊政策的“正面意义”,严重曲解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的“正面意义”。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交涉尤其是涉及香港回归的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国方面比较少,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就是五部:一部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和“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换届”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撰写的《外交十记》^④;一部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委会”秘书长李后在1990年由于身体因素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撰写的《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⑤;一部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许家屯在1990年由于“政治因素”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在美国撰写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⑥;一部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的“演讲记录稿”——《中国

① Time to Declare, London, 1991.

②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1994. 中国内地翻译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地区翻译为戴卓尔夫人,在台湾地区翻译为柴契尔夫人。中文本为台北月旦编译小组译,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一版。

③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1993. 中国内地翻译的科特雷尔,在香港地区翻译为罗拔·郭瞳。中译本为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⑤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⑥ 香港联合报有限公司1994年第一版。